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法的现代应用研究专题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制胜智慧

——基于《孙子兵法》“五事”视角的解析

苏成爱, 刘 娇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智慧不仅可以应用于治军用兵之中,也可以创造性地应用于治国理政之中。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体现出非凡的治国理政智慧。从《孙子兵法》“五事”的角度来看,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短期内就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具有必然性:一是改革开放事业合于“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改革开放事业把握“天”时,顺势顺势而为;三是改革开放事业因“地”制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四是改革开放事业之“将”者,五德兼备;五是改革开放事业遵循“法”则,通过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孙子兵法》;五事

中图分类号: A 491.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4.02.00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孕育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肥沃土壤,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努力将这些古老的智慧融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筚路蓝缕,以巨大的政治勇气,进行艰苦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体现了非凡的智慧。非凡的智慧是在改革开放事业四十余年的不断实践与探索中逐步开创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沉淀与积累中精心雕

琢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征程的深刻反思与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亦是承载于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文明演进与传承中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孙子兵法》之“道、天、地、将、法”五事理论框架可以用来揭示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其胜利具有必然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目标于“道”,顺势顺势而为于“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于“地”,五德兼备于“将”,严格规章制度于“法”。若深谙“道”之奥妙,则改革开放国泰民安之世不求而得;若逐“地”顺“天”之势,则改革开放之路曲径通幽辟捷径;若才挟“将”之风范,则改革开放之舟柳暗花明又一村;若守“法”之纲领,则改革开放事业之航如虎添翼腾空起。总揽改革开放之盛绩,既彰显了昔日之辉煌,也铺就

收稿日期:2024-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阳明军事著作校注”(18FJS009);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优秀文化融入财经类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3SXZZ025)

第一作者简介:苏成爱(1978—),男,江苏徐州人,特聘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suchengai@126.com

了未来深化改革之路。这既是对过往成绩的肯定,也是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启迪。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道”

“道”是中国传统军事哲学和政治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在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程中,“道”关乎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地位十分重要,居于诸事之首;若深谙于“道”而行“道”,则国家繁荣、民众安泰。孙子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21]“道”的本质在于百姓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共襄盛德。民众之所以“不畏危”,表明人民与国家的领导者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国家的领导者能够站在人民立场,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善良的动机和愿望,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则是改革开放成功开启的重要前提^[3],亦是孙子“道”之民本思想对当代的现实解读。改革开放,初心在人民,过程由人民推动,结果是人民共享福祉。

顺应人民要求,是改革开放的内驱力。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95} 改革开放的历史亦然,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5]118},强调了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或经济体制改革,更是从根本上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发展生产力、提升生活质量的强烈呼声。这种呼声所体现的是人民意愿与期待,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根本逻辑和动力源泉,彰显了改革开放从始至终都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质属性;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是助航之风帆,稳定之锚石。“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6]135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些改革开放里程碑式的成就,皆源自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不懈努力。在邓小平看来,“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7]368},只有坚定不移地依托于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与力量,勇于“啃硬骨头、动奶酪”,激发和倚重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首创精神,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探索之间的有效对接与良性互动。这种良

性的互动不仅可以推动政策的精准落地,还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汇聚成破除旧框架、探索新路径的强大动力,确保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让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硕果,是改革开放所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5]364} 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主力军,理应共享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成果。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最终要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方能够得以充分展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逐步实现。

水之于舟,既能承载也能倾覆。历览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民本思想乃天下归属之关键——厚爱百姓者得天下,违背民意者失江山。要真正地从人民角度出发,则须深入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洞悉民意,以民所望为施政之本,以恩泽润民心,终成众望所归,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始终承载着党和政府对人民深厚的初心,以人民的参与和推动为过程,以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回答好“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这三个事关改革开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二、顺时而为——“天”

所谓“天”,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只是客观纯粹的自然现象,是被利用的对象。在孙子心目中,“天”就是“阴阳、寒暑、时制也”^{[2]2},是可以用来趋利避害的天时。他精准地捕捉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寒暑交替以及时间的节律,完全剥离了对“天”的任何客观唯心主义的人格化解读。这一观点在孙子所处的上古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那时的人们充斥着对“天”的深度敬畏和迷信态度。他进而提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2]104} 的战略哲学思想,主张打仗时应顺应并善于运用客观规律,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结合自身的战略战术,顺势顺势而为。这为后世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顺势顺势而为则是当代的人们对孙子“天”的思想的现实解读。跨越了四十多年的辉煌旅程,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

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无不归功于我们党对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精准把握。

近代中国站在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口浪尖,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仁人志士,他们高声倡议对内进行改革,对外进行开放,力图寻找国家振兴之道^[8],然而由于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一时壮志难酬。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面对富起来、强起来的新任务,党带领人民积极引进并学习苏联等国的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通过实施“三大改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重建家园、振兴国运的关键时期。此时,世界的主题逐渐趋向于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科技革新以惊人的速度推动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中国果断抓住了时代的机遇,邓小平同志凭借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5]117},挣脱陈旧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冲破个人崇拜的桎梏,以积极的态度主动与世界接轨,力主“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5]242},引领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须“审时度势”,“随遇而安”。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观天之道,执掌其中”,紧握“时势造英雄”的钥匙,以“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之智,擘画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9]3}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历史的巨轮上勇往直前,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中华民族一定会有更伟大的飞跃,创造出更加璀璨的奇迹。

三、因地制宜——“地”

孙子言“地”,强调了用兵及作战时必须考量

的外部环境因素。孙子关于“地”的理论同样可以借鉴性地运用于改革开放事业中,即把握好我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2]2},这揭示了战争中应当考虑到的种种地理条件。孙子在揭示种种地理条件后,创新性地提出他对地形理解的核心观点是“夫地形者,兵之助也”^{[2]102},揭示了地理条件在军事战略中扮演重要的辅助角色。发挥好这一作用,关键在于军队如何根据地理环境灵活作战,精准地因地制宜。他倡导军队须深入学习和熟练运用各类地形的特性,将原本不利的地势转化为有利的战略优势,从而在逆境中转危为安,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保持主动性,保持先机,确保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孙子对军事智慧的深刻把握,也可以为各种战略部署提供转化挑战为机遇的重要策略。

经济特区的设立是邓小平倡议并得到中央政府决策支持,在新时期国民经济战略调整背景下精心创建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战略选择主要基于这些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和对外开放的战略考量,旨在寻找和确立我国改革开放的有效路径。特别是深圳与香港、珠海与澳门紧密相邻,汕头因东南亚国家潮州籍人士众多,而厦门则得益于闽南人在海外经商的广泛网络,这些独特的地理和人文条件为对外开放战略找到了理想的切入点和发展方向。在邓小平同志首次视察经济特区之后,他做出了扩大沿海开放范围的重大战略决策。1984年国家最终确定了增加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标志着经济特区战略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随后,深圳特区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一系列地方发展模式的相继出现,为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和动力。这些模式的成功实践不仅彰显了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地域特色发展战略与中国复杂国情之间的深度契合,满足了国家渐进式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这种以地理优势为基础,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进行战略布局的智慧和远见,无疑可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为未来深化改革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特别是经

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实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期间变得尤为明显。党和政府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1世纪的改革开放继续沿用过去的基本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开始实施一系列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政策和措施,如西部大开发等。以贵州省为例,尽管其山地多、地形复杂,并不具备发展传统工业的地理优势,但正是借助其独特的凉爽气候,贵州省贵阳市成功转型为中国的大数据中心,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典范。此外,其他城市也通过各自的方式突破地理限制,实现了特色发展。如,甘肃省兰州市利用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的地理位置,发展成为连接我国西部与中亚、欧洲的国际物流中心。重庆市则利用其山城特色和长江水运的优势,发展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吸引了大量外资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通过准确识别并充分利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独特优势,即使在地理条件貌似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也能化不利为有利,因地制宜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是对孙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2]102}观点的创造性应用。

四、五德兼备——“将”

孙子强调“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把具备“智、信、仁、勇、严”^{[2]2}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国之辅也”^{[2]26}。将帅是国家的辅佐,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安危。高明的将帅可以在面临险情的情况下,通过精心谋划,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而平庸的将帅即便处于有利的态势,也可能会因指挥的失误,丧失战机,由胜转败。因此,孙子把将帅的素质作为预测战争胜负的一项重要因素。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成功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长期实践中,表现出了超于常人的理论勇气与高超的政治智慧,不愧是五德皆备的优秀帅才。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了“智、信、仁、勇、严”五种优秀的品质。“智”即战略远见与策略智慧。在战略远见方面,邓小平能够准确地判断国内外形势,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建立经

济特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等关键举措,都体现了他卓越的战略智慧。在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环境时,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10]“信”即诚信守诺。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孜孜不倦地去增进人民福祉,在人们充满疑虑的时候,通过实际行动兑现了这一承诺,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扩大实施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无一不是在人们的疑虑中信守承诺的体现,这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信赖。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正是验证了邓小平所言“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5]102}。“仁”即民本思想。邓小平曾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6]714}他始终恪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怀民生、致力民富、扩大民权、顺乎民意、汇聚民智等等,体现了仁爱之心。“勇”即改革的决心与勇气。面对改革初期的困难和挑战,邓小平坚持不懈,勇于改革,敢于破除旧的体制机制束缚,推动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种种疑虑和反对声音时,邓小平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严”即制度建设与法律约束。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7]254},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改革开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党内外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和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改革开放的良好秩序。另外,邓小平也善于在改革开放中用“将”,即善于大胆使用五德兼备的得力干部。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做详细论述了。

总之,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所体现的“五德”,不仅使改革开放事业柳暗花明,而且为我们今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将孙子关于“将之五德”的古老智慧与现代视角相结合,就是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即要德才兼备,忠于党,脚踏实地,意志如铁,英勇善战,有知识,懂专业,等等。

五、严格规章制度——“法”

“法”乃改革开放事业之准绳,循其“法”则,

改革开放事业将如虎添翼腾空起。孙子极其重视作战中的“法”,认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2]。“法”就是国家的制度,是法律,是规矩。孙子将“法”分为了三个部分,其中,“曲制”主要是指军队的组织架构、指挥系统以及部队的编制,即管理之法;“官道”就是统帅将士的策略,即用人之法;“主用”是指对军需物资供应和保障的管理,即经济之法。只有当军队拥有完整且健全的管理体系时,他们才能在混乱的战场环境中发挥出最出色的战斗力,并最终取得胜利。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亦是如此,我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开始制定和修订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的规章制度,为改革开放事业保驾护航。“曲制”——管理之法:推行分权放权政策,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行简政放权政策,旨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宽松有利的制度环境;选择在特定地区如经济特区进行政策试点,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其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锋,这些特区在政策和经济体制上进行大胆探索,积累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鼓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官道”——用人之法: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重视干部和人才的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的结合,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邓小平在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7]^[36]党的十二大把干部队伍建设要实现“四化”写进党章,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同时也鼓励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确保改革开放事业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支持。相应的规章制度有1983年的《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等。“主用”——经济之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和推动对外贸易等措施,打开我国通往世界的大门;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

在邓小平的引领下,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不仅是简单的政策调整,更是对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重构,包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完善企业管理、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都需要建立一套规则和程序,即“法”的体现,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制定等,这些法律为企业改革、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产权保护等提供了基本框架。邓小平强调法制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意识到,要使改革开放成果得以巩固,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支撑,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加强法制建设成为改革开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的社会管理和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对“法”的深刻理解和应用确保了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在有序的环境下行稳致远。

我们有必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不断地深入发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永久魅力与时代风采,从而为深化改革开放指明方向^[11]。若把改革开放事业比作一艘破浪前行中的巨轮,那么“道、天、地、将、法”则是构成这艘巨轮的坚实框架和强大的动力系统,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就是这艘巨轮的导航系统,始终导航着这艘巨轮于波涛之上行稳致远。从孙子“五事”的政治意蕴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顽强拼搏,这种“道”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事业,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显得尤为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将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等外部因素纳入考量之中,从而设计出一套符合自身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和方略,“天”、“地”这样顺应潮流、适时而动的政治哲学在当今我国的经济建设、外交策略中,都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在当下复杂

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将”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高标准和多维度,“将之五德”不可或缺;“法”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是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也是为其实现统治和延续统治的工具。这些都与《孙子兵法·计篇》中对战争取胜条件的要求是完全契合的。所以,从这个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 人民日报,2014-10-14(1).
-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所《孙子》注释小组. 孙子兵法新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关海庭. 中国共产党成功启动改革开放原因再分析[J]. 中共党史研究,2022(3):137-147.
-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1975—1997)[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7]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8]惠建国,刘冠军. 寻找改革开放成功的中国密码[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3):3-13.
- [9]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石建国. 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智慧[J]. 邓小平研究,2020(1):8-17.
- [11]刘恋. 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新转化[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15.
- [1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角度来说,我国短期内取得改革开放事业的阶段性重大胜利具有必然性。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总结运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改革新经验,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12]107}。

Deng Xiaoping's Winning Wisdom in Lead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Matters” in *The Art of War*

SU Cheng'ai, LIU Jia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Art of War* can not only be applied to military governance, but also can be creatively applied to governing the country. Deng Xiaoping, as “the chief designer of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opening-up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demonstrated extraordinary wisdom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long-term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reform, opening-up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ve Matters” in *The Art of War*, it is inevitable that Deng Xiaoping l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achieve significant victori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irstly,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ause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Tao” and adhere to putting the people at the center; secondly, the caus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hould seize the “timing” and act accordingly; thirdly, the caus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hould b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everything should be based on reality; fourthly, the “general”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ause should possess five virtues; fifthly,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aus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law” and regulate and guarante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various work through systems.

Keywords: Deng Xiaop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Art of War*; five matters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苏成爱,刘娇.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制胜智慧:基于《孙子兵法》“五事”视角的解析[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4, 41(2): 5-10. SU Cheng'ai, LIU Jiao. Deng Xiaoping's Winning Wisdom in Lead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Matters” in *The Art of War*[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4, 41(2): 5-10.